



总第10693号 国内统一刊号:CN33—0018
邮发代号:31—2 热线电话/传真:(0571)88852349 88860470
电子版:www.zjgrrb.com
E-mail:alan0104@163.com
地址:杭州市余杭塘路69号12号楼109室 邮编:310012

星期 特刊

省内早期的无偿器官或遗体捐献者中,不少来自传统保守思想较为顽固的地方,在献出“生命的礼物”后,一些回到家乡的器官或遗体捐献者亲属遭到了旧观念的猛烈攻击——

“道德审判”,不堪承受之重

■记者杜成敏

在人体器官捐献这件事情上,我国传统伦理道德有其两面性:既有死者为大、入土为安的旧观念,也有舍生取义、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的善与美。

据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的数据,近6年,我国捐献器官

和遗体的志愿者人数增长了100倍,超过了10万人。

理论上讲,眼角膜可分层移植,一对眼角膜可以让4至5人复明,一次全部器官的捐献,最多可以挽救12个人的生命。这是“救人一命”的大善和大美。

但遗憾的是,由于我国关于器官捐献的法律法规不尽完善,省内早期的一些无偿器官捐献者,在献出“生命的礼物”后,其回到家

乡的亲属却遭到了传统旧观念的猛烈攻击,忍受着“道德审判”所带来的难以言喻的痛楚。

关注器官捐献时刻的伟大,是弘扬社会正能量。记录捐献身后的冷暖故事,是为了给社会以警醒,让更多善意、温暖和阳光洒向人间。

一

面对满天飞的谣言,她倔强地不去争辩。两年后,她签下了自己的一份角膜遗体捐献志愿书,用行动去支持丈夫的遗愿

在杭州近郊某村,蔡万华的热心是出了名的。

村里去镇上有5公里路,他每次进城,都要用自己的小货车免费捎上同路的村民,回来时再把大家带上;他会木工活,每当村民需要修个门、补个家具,他都免费上门服务;他对长辈孝顺、对妻子女儿关心爱护,做人通情达理,丈母娘直夸他“样样优秀”。

然而,就是这样一位大好人,2009年被查出患有淋巴瘤,并已经扩散转移。

蔡万华剩下的时间不多了,生前最后一个月,蔡万华在取得妻子朱艳及家人的同意后,做了人生的最后一件好事——无偿捐献自己的眼角膜和遗体。

这是当地第一例眼角膜和遗体无偿捐献。蔡万华过世后,眼角膜移植给了一位7岁男孩和一位40岁的女性,遗体捐给浙江大学医学院用作医学研究。

当时,眼角膜和遗体无偿捐献的宣传不多,在“身体发肤授之父母”的传统观念下,无偿捐献眼角膜和遗体,很多人观念上还接受不了,尤其是遗体捐献,需要进行医学解剖研究满3年后才能取回骨灰。

蔡万华的这一举动,在当地引起热议,许多网民在当地的一个网上论坛上对“到底该不该捐”进行了大讨论。

而在村里,一场谣言风波正在酝酿。按照当地丧葬习俗,蔡家应该摆

设灵堂,蔡万华的遗体要摆放三天再火化,最后亲戚朋友一起送行,热闹风光地入葬。

“我老公很嫌弃这样大操大办铺张浪费的习俗,他说不如做点更有益于社会的事情,把遗体捐出去,为淋巴瘤的治疗做点贡献。”朱艳说。

但是,在农村的小社会里,一点小事都是茶余饭后的谈资。听闻蔡万华的死讯,却不见隆重的白事,连遗体也不知所踪,这在村里可是一件轰动的“大事”。谣言开始在三五成群的村民聊天中传播:“听说是卖了,卖了20万呢。”“我怎么听人说是50万,是把器官都卖了”。

蔡万华老家在安徽,与朱艳结婚后就与妻子父母同住,这也成为了村民数落他们的理由:“虽说说是外人,但为了钱也不能做出这种事。”

蔡万华的治疗花去了家里所有积蓄,还欠下了一大笔债。为了还债,朱艳把两个女儿交给父母,自己出门打工,也正好避开闲言碎语。这是一个坚强的女人,面对满天飞的谣言,她倔强地不去争辩。丈夫去世两年后,她给自己签下了一份角膜遗体捐献志愿书,用行动去支持丈夫的遗愿。

多年来,她打零工、做保姆,一分一分地还债,终于在今年,彻底还清了债务。

她至今未再嫁,去领回丈夫骨灰的那一天,她经过浙江大学医学院无偿遗体捐献者的“无语良师碑”前时,看到了丈夫的名字。“嗨,英雄。”她看着怀中的骨灰盒,在心里打了声招呼。

四

法律亟待进一步完善

翻阅2007年5月1日起开始施行的《人体器官移植条例》,发现该条例对人体器官捐献以及人体器官移植的流程作了规定,对医疗单位、红十字会等相关部门不按法定流程操作,规定了要承担的法律責任,而对比如器官运送的绿色通道问题,对捐献者的医疗欠费、丧葬补贴,对捐献者家属的误工补贴、困难救助,以及对捐献工作的保障和激励等,条例却并未作出规定。

一位角膜遗体器官捐献协调员说,实际工作中,这给人体器官捐献和移植工作带来不少后遗症,“我特别期待法律能够得到进一步完善。”

据悉,为了弘扬社会正能量,在目前法律还不是很完善的情况下,浙江省红十字会给出了一项优抚政策:对于人体器官无偿捐献,一次性给予家属2万元慰问金,若是困难家庭,再一次性增加3万元的困难补助。但对角膜、遗体无偿捐献,目前未有任何补助。

此外,杭州市红十字会也将“春风”吹到角膜遗体器官无偿捐献者及其亲属身上,将其纳入“春风行动”的优惠援助对象,对角膜、遗体无偿捐献,各一次性给予家属慰问金1万元,人体器官无偿捐献一次给予2万元,困难家庭一次性给予2万元慰问金。

期待故事更完美的结局

这些故事所带来的伤痛,是法律和制度空白的一个影射。制度的缺失,可能会让善者难续其善,还可能让善者无端背上“恶”的名声,这是善良的人们最不愿意看到的。

公平的救助、贴心的服务、对尊严的保障,这是一个有爱社会应该给予行善者的尊重,也是社会自爱的一种表现。爱别人,其实是爱自己。不是吗?当至亲至爱的人在病床上苦苦等候器官移植的时候,谁不希望好人快点出现!

我们期待故事有更完美的结局。让我们一起守望相助。



二

“怎么有你这么不孝的儿子,把你爹的器官都给割了!”

冯滔为父亲守灵的第一晚,村里一个人也没来,这可能是这个贵州山村里有史以来最凄凉的一场白事。

就在下午带着父亲骨灰进村的时候,冯滔的伯伯还跟一位村民吵了一架,双方甚至动起了手,因为对方说了一句:“真没良心,人都死了还要把心肝挖走。”

冯滔的父亲名叫冯周发。这个名字在冯滔回乡不久前同时出现在浙江省的各大主流媒体上,他是“浙江省首例人体器官捐献”的主人公,报纸、网络、电视都是满满的一片赞誉声。

2010年8月,来杭州打工的贵州人冯周发遭遇车祸,深度昏迷两个月后,医生发出病危通知。在器官捐献协调员的争取下,家人同意将逝者的器官无偿捐献。

当时,浙江省刚成为全国公民自愿器官捐献试点省份之一。冯周发因此成为了“首例”。

2010年10月11日,医院宣布冯周发医学死亡。他的一个肝脏两个肾脏从体内摘除,并很快被移植入一名肝衰竭和两名肾衰竭患者体内,救活了三条生命。

浙江省红十字会为此专门开了一场新闻发布会。上台发言的时候,冯滔有点发懵,21岁的他没有见过这样的大场面,只是快速念完了事先给他准备的纸条,就匆匆下来,也记不得自己说了什么。

三

在朱强荣的帮助下,刘丽走出了抑郁症的阴影,开始正常的生活和工作

当朱强荣到达刘丽住的村子时,已是深夜12点。

在一处山坡上,朱强荣拿出手机,拨通了刘丽的号码。

“刘丽啊,我们到了,在你们村边的一处山上,你们在哪里?”

“朱大哥,村里现在最亮的地方就是。”朱强荣往下一看,村中果然有一处灯火,于是发动车子一路颠簸前行。

朱强荣是一名有着近20年工作经验的角膜遗体器官捐献协调员,同时也是我省第一个角膜捐献志愿者,他的志愿者编号是“001”号。

角膜捐献与器官捐献不同,不会马上在医院进行手术,而是在捐献者死亡一定时间后进行摘取,因此手术有可能是在病床上、太平间或丧事期间。此次深夜进村,就是到正在办丧事的人家进行角膜摘取,而此次角膜捐献者就是刘丽的父亲。

车上除了朱强荣,还有两名医生、一位司机。夜已经深了,车子驶过村庄,一阵阵狗吠声响起。

快到目的地的时候,汽车进不去,朱强荣便和两名医生下车步行。

见到刘丽的时候,灵堂里人不多,角膜摘取工作也很顺利。就在朱强荣一行准备离开的时候,突然隔壁冲出了一帮人,带着一股酒气。

“刘丽啊,怎么回事啊,为什么会有穿白大褂的人在这里啊?”其中一个人问刘丽。看样子,这些人应该是死者亲戚。

“他们是来拿爸爸捐献的角膜的,这也是爸爸的遗愿。”刘丽说。

朱强荣也赶紧插话:“谢谢,谢谢!阿弥陀

佛,这是做功德无量的好事。”

“什么?人都死了,还要把眼珠子给拿走啊,刘丽,这种事情好做出来的啊!”一帮人瞬间炸开了锅。刘丽不敢出声了。

“这是死者本人和家属都同意的,他们还签字了。”朱强荣一边说,一边示意两名医生快走。

“谁晓得啊,这个字晓得是谁签的啊!”对方情绪激动,气氛更加紧张了。

“朱大哥,你们赶紧走。”刘丽小声地说。趁这帮亲戚把矛头指向刘丽时,朱强荣赶紧撤了出来。

车子开出十几分钟后,朱强荣手机响了,收到一条短信,他拿起来一看,立刻心头一凉。

短信是刘丽发来的:“朱大哥,如果我的死,能够唤起大家对我和爸爸的谅解,是不是也值得了?”

一车人惊得不敢说话。怎么办?回去肯定不行。朱强荣毕竟做了多年协调员工作,他稳住情绪,拨通了刘丽的电话,电话那头是一片片哄哄的声音。

“刘丽啊,你不要吓朱大哥,朱大哥有高血压和心脏病的,如果因为这件事你要走,那我也活不下去了。你爸爸还在天上看着呢,别做傻事啊。你一定要坚持到明天早上,相信朱大哥,一定会帮你解决的。”

挂了电话后,朱强荣一夜未眠。

第二天上午8点多,他立即拨通了当地政府的电话,说明了事情的来由:“如果因为角膜捐献而出了人命,这将是轰动全省甚至全国的丑闻!请你们一定要处理好后续工作,好事千万不能变坏事!”

当地政府部门立即响应,通过镇村层层下

心肝都割了。”“他们家有钱,卖器官赚了很多呢。”很快姑娘就跟他断了联系。几次之后,冯滔也拒绝了一切说媒的人,如今28岁的他依然单身。

当地镇政府对冯周发无偿捐献器官的事情一无所知,一名工作人员甚至怀疑他们被骗捐了:“没有任何官方的途径告知我们。既然是当地省红十字会,为何你们回来时没有派陪同人员作村民的解释工作?没有机构跟我们对接过,(我们)怎么帮你们化解矛盾?”

冯滔说,记得红十字会的人说过,“将来会立一块捐献者纪念碑,冯周发会是第一个刻上名字的人”,正是因为这句话,触动他们全家人签了字。

但是7年过去,这块纪念碑未见踪影。

一次,冯滔在一个无偿器官捐献志愿者微信群里提及此事,一名自称是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批评他:“你不要老是提纪念碑,器官捐献是无偿的,捐献这件事本身的意义更大!”

冯滔回复:“您说的都对。”随后就退群了。“他说的确实没错,对于生者来说,一块纪念碑能带来什么?但这是对死者的承诺!”冯滔说,“首例无偿器官捐献”的热闹早已过去,这项义举给他们家带来的代价太沉重,纪念碑无非是生者为死者争取的最后一点尊严。

在办妥父亲的丧事后的不久,冯滔带着母亲、妹妹离开了贵州。

冯滔至今没有后悔当初做的决定,只不过在走出村庄的时候,他突然想起了签完字的那天,他静静地看着昏迷的父亲的脸,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,一如此刻他的心情。

派,上门调解,把矛盾压了下去。

只不过可怜了刘丽这个弱女子。那天晚上之后,她到底经历了什么,无人知晓。

之后的一段时间,刘丽说,觉得自己无论走到哪里,背后都有无数双眼睛盯着她,所到之处总有人对她指指点点。刘丽后来连班也不敢上了,把自己关在了家里。不久后,抑郁症缠上了她。

刘丽的不幸,成了朱强荣心里的一个结。按照任务,协调员只要完成家属的劝捐工作,没有责任去管理后续的事。但是,朱强荣说,只要知晓人情冷暖,就无法做到弃之不理。如果刘丽真的想不开做了傻事,他决定今后再也不碰协调员这份工作。“万一她做出了傻事,我工作的意义在哪里?”

当务之急,他要想办法帮助刘丽走出抑郁症这个“魔鬼”的控制。“刘丽,你答应朱大哥,每天晚上7点的时候,你都留出时间,朱大哥会给你打电话。”

因为协调员的工作需要,朱强荣接受过心理辅导员的培训,“每天固定的通话时间,会给她一个暗示:这个时间有人要跟我说话,有一个念想、像一个任务,会让她感觉还没被这个世界抛弃。”

这是发生在2009年的真实故事。故事的结局最终是朝着我们喜闻乐见的方向发展:在朱强荣的帮助下,刘丽走出了抑郁症的阴影,开始正常的生活和工作,身边的人也淡忘了这件事。

但当我们问及此事,刘丽便沉默。“我不想成为任何场合的焦点。有人关注我的话,我会非常害怕,我就想普普通通地活下去。”刘丽说,“现在最想做的事,就是看一眼移植了我爸爸眼角膜的那个人,想知道他的眼睛怎么样。但一定要偷偷的,不能让他知道。给我看照片也行。”她像一只惊弓之鸟,连做最渴望的事,都时刻准备着“逃跑”。

事情是否真的过去了,只有刘丽心里清楚。

(应受访者要求,文中刘丽为化名。)